

社區公民教育資源開發的權責劃分：

以倫敦市博物館為例

Redistribution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utilizing citizenship education resources in the community: The case of Museum of London

葉王蓓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

摘要

在課程分權的背景下，如何有效開發、使用社區中的課程資源，已經成為當下倍受關注的話題。本文通過介紹倫敦市博物館配合國家公民教育課程計畫，製作相關課程資源的嘗試，指出社區公民教育資源開發的過程中，涉及權利、責任的重新劃分：首先，課程分權並不意味必定減少中央力量的影響。適當的中央介入，可以轉變博物館的傳統角色，協調不同的部門，從而發掘緊密聯繫學校教學、公平分配的課程資源。其次，課程分權不僅意味學校，也包括社區獲得更多權利。博物館可以成為課程決策者，根據其強調寓教於樂的學習傳統，為學生提供真實、做中學的公民教育課程。另外，社區組織與學校合作，協助教師教學的全過程，能更進一步確保學生使用社區教育資源的成效。

關鍵詞

社區教育資源，公民教育，權利與責任，倫敦市博物館

Abstract

How to effectively explore, utilize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the community, is a major concern against the curriculum decentralization context. This article uses the experience of Museum of London, argues that linking community resources to schools involves the redistribution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Firstly, curriculum decentralization doesn't mean excluding the state. State can change museums' traditional role, co-ordinate the other institutions, thus explore educational resources closely relevant

to school curricula and ensure the resource distribution equity. Secondly, curriculum decentralization doesn't mean decentralizing power to schools alone but also to the community. The museum can work as an active curriculum maker. Based on its "edutainment" learning tradition, the museum plays a key role in developing citizenship education curricula featured with play and learning. Besides, collaboration between museum and school teachers can further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Keywords

educational resource in community, citizenship education, right and responsibility, Museum of London

引言

近 30 年來，跟隨世界教育改革的趨勢，課程分權 (curriculum decentralization) 成為亞洲國家、地區教育改革的重要措施 (Mok, 2003)。這一全球趨勢背後的理念認為：課程分權可以增加學校和當地社區、商界等的聯繫，從而更有效地提高地方課程資源的利用率。然而有趣的是，在亞洲國家，尋找、開發、使用社區課程資源，卻被視為課程分權遇到的最大的困難之一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 2005)。在日漸強調參與社區的公民教育課程中，這一困難顯得更為突出。眾多社區公民教育資源，比如博物館、圖書館、文化中心、中國內地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等，在課程分權背景下並沒有被善加利用，有的還出現越來越少學生光顧的情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博物館等社區資源與學校改革脫節，以致於學生不能從參觀中學習，學校則僅僅把參觀作為一種調劑的方式 (Chee, 2003)；另外一方面，博物館等社區資源沒有更新展出方式、形式，不能吸引學生。內地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展覽方式甚至被批評為呆板的「玻璃+櫥窗」 (林建芳, 2003)。

這與亞洲地區長期集權的傳統有關。教育分

權，是相對比較新的現象。至今，許多學校、教師仍在努力適應課程分權帶來的角色變化。而教育系統之外，社區如何分享權利與承擔責任，更缺少深入探討 (Björk, 2006)。雖然，也有學者注意到社區在提供教育資源方面的重要性，並建議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以及社區資源整合 (袁國明, 2001)。近來的研究，也有介紹社區資源開發的經驗 (見吳國志, 2010)。但是，如 King & Guerra (2005) 的研究指出：亞洲地區分權不完整，一些國家僅僅把教育財政責任、提供教育服務的責任下放，卻並沒有給地方、學校提供相應的權威和資源，也無法保證教育資源分配的公平性；同時，分權僅僅把權力劃分給不同層級政府、部門、學校，卻缺少相互間的合作，引起很多混亂和困惑。

就這一問題，本文以倫敦市博物館製作的中學公民教育課程資源¹為例，並分析相關線上課程資源、倫敦市博物館年度報告及倫敦市博物館學校事務協調處提供的中學回饋問卷數據等材料。本研究試圖指出，分權背景下社區課程資源開發的議題，其實涉及政府、學校、社區之間權利與責任的重新劃分。而倫敦市博物館的例子，為我們開發、使用社區公民教育資源提供三點經

驗：第一，課程分權並不一定意味減少中央力量的參與。由於英國政府政策的引導和支援，博物館進行服務角色的轉化，從而提高了社區課程資源的可親近性、針對性、和公平性。第二，社區課程資源開發的主體，未必一定是學校教師，社區也可以直接開發課程。倫敦市博物館借助於它本身的優勢，為學生提供真實、在做中學的公民教育學習機會。第三，學校與社區之間不僅需要分工，更需要合作，才可以加強學生學習社區教育資源的學習效果。

政府介入：發掘、引導和公平分配博物館公民教育資源

自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的博物館逐漸成為國家文化的代表，培育國民身份認同的重要機構 (Macdonald, 2003)。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博物館，倫敦市博物館由三個分館組成，藏有兩百多萬件藏品，跨越了一百萬年歷史。無疑是社區中，能為學校提供豐富公民教育資源的機構。然而，早在上個世紀 20 年代，英國學者就發現，優秀博物館資源很少為學校教學所用的問題 (Shann, 1920)。根據 Hooper-Greenhill (2007) 對英格蘭博物館和學校的研究，博物館的主要參觀人群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中上層白人社會。而博物館更偏重根據權威，如博物館員、學者、專家的判斷決定博物館的發展方向 (Elican Hooper-Greenhill, 1999)。到上個世紀末，David Anderson (1997) 在《共同福利》報告指出，仍然有半數以上英國博物館沒有開設和學校學習相

關的項目。這些，都影響了博物館在支持學校公民教育上積極的表現。

為了引導博物館資源為學校公民教育服務，首先，英國政府通過制定政策，一方面轉變博物館權威的傳統文化，促成其由關注物品 (object-oriented) 向關注觀眾需要 (audience-oriented) 的轉變。英國政府在其文化政策中重新定義「博物館」指出，博物館是「關於物品，為了人民」 (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2000)。並對博物館提供的公眾服務品質，進行評估。另一方面，明確提出博物館要服務學校教育的要求。國家課程裡提出博物館要考慮如何滿足孩子、教師與國家的需要。尤其要致力於公民教育：促進社會和文化的融合。其次，英國政府通過財政支持和協調不同部門的合作，保證博物館課程資源能夠針對性地服務學校教學、確保教育資源配置的公平。

倫敦市博物館在政府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評議會 (MLA) 的「文藝復興」計畫 (Renaissance Programme) 資助下，根據國家課程計畫規定的科目和年級編制學習手冊、建立線上學習資源庫。線上資源庫中 59 個資源 (資源庫總共 73 個文件) 與學校公民教育《公民》、《個人、社會、經濟和健康教育》課程相關。製作這些學校學習資源的開銷占博物館 2009-2010 年度開銷的 15% 左右 (Museum of London, 2010)。在關注公平性上，倫敦市博物館為特殊需要的學生和學校提供專門的課程資源，也可以親自到學校提供服務。並且，盡力降低學校參觀博物館的

¹ 本文所分析的材料為《倫敦市博物館 · 倫敦市博物館 (碼頭區) 中學學習項目 2010-2011》 (Learning Programme for Secondary Schools 2010-11, Museum of London, Museum of Docklands)。

費用：倫敦市的學校參觀、使用倫敦市博物館開發的課程資源、服務全部免費。倫敦市交通部門，為參觀博物館的學校提供免費乘坐巴士、地鐵的服務。另外，倫敦市博物館 2009 年建立核心學習中心，確保學校使用教學設備方面的基本公平。參觀的學校在博物館內都有充分的空間、設備學習博物館開發的課程資源：提供設有舞臺的大劇院，保證角色扮演等教學活動的空間；提供多樣的電子教學設備，並支持電子相機、攝像機、手持遊戲機、ipod 和手機使用博物館開發的教育資源。

博物館開發公民教育資源：另一種學習體驗

同樣作為學習、文化機構，博物館與學校提供的學習體驗相當不同。博物館內的學習自由、立體、複雜、真實與豐富。學校教師使用的課堂教學方法，被認為不能適應博物館的學習，甚至還可能阻礙博物館內的學習（Olson, 1999）。近 30 年來的研究指出，博物館的學習，不同於簡單、單向、線性的學習模式，代表另外一種學習模式的視角，比如建構主義、多元智能理論、社會文化的視角（Falk, 2004）。Hooper-Greenhill（2007）用「寓教於樂」（edutainment）這個詞語來總結博物館的學習體驗。

倫敦市博物館開發的公民教育課程資源，圍繞中學公民教育課程計畫的關鍵概念：民主與正義、責任與權利、多元與統一，成為有教養、負責任、能採取行動的公民，發揮了博物館學習模式的優勢。

一方面，提供逼真的學習環境。Griffin & Symington（1997）指出，越來越多的博物館採用多樣的媒體和方式陳列展品引起參觀者的興趣。

倫敦市博物館採用了三維空間設計、真實復原、多媒體等方式，呈現展品。比如，《倫敦市博物館，倫敦市博物館（碼頭區）中學學習項目 2010-2011》這麼介紹倫敦市博物館（碼頭區）「1840-1850 年倫敦水手小鎮」的陳列：

走進黑色的巷子探險，那裡有維多利亞街頭一樣的燈光、聲音、甚至氣味！路過異國情調的百貨商店、雜貨店、和水手的寓所。然後，我們再去三個水手酒吧小坐（p.6）。

倫敦市博物館在介紹歷史人物、事件方面，則常常讓職員扮演某些角色，在表演的過程中和學生互動、對話，並讓學生在這個過程裡進行批判思考。在《婦女參政論權者》這一教程裡，博物館職員扮演歷史人物 Kitty Marion²，通過互動戲劇表演，告訴學生婦女參政論權者絕食、罷工，被強迫進食的事情，以及她本人為何爭取婦女選舉權。學生則可以向扮演者提問，討論選舉權在民主進程，以及選舉過程中的意義。

另一方面，倫敦市博物館採用杜威「在做中學」的思路組織教學活動。通過豐富多樣的教學方法，讓學生在玩的過程裡學習、實踐公民教育的知識、技巧、態度。館內學習不僅僅局限於介紹知識的活動：博物館職員的介紹、博物館內參觀。館內學習更強調學習的過程，更多的採用如

² 20 世紀初，參加激婦女參政運動的一名女演員。

下教學活動：舞蹈、戲劇、表演、寫作工作坊、辯論、演講、展品接觸。通過不同教學方法之間的互相配合，給學生提供互動、自主的學習體驗。

例如，在《我是一個倫敦人嗎？》該教程裡，為了幫助學生瞭解公民教育的概念：民主與公正、認同與多元，首先通過印度舞蹈的工作坊，引發學生思考，是什麼因素，將多元的倫敦社區聯繫起來，並創造了跨文化的表演藝術？接著，開始創意寫作工作坊，學生反思他們自身文化是如何影響他們生活的地方。然後，館內參觀會帶領學生關注，自羅馬人入侵時代以來，倫敦人從何而來，由什麼人構成，以及如何變化？

教師、博物館合作：社區公民教育學習的鞏固與發展

一直以來，學校和博物館合作有限影響博物館學習的成效。學校、教師在發掘博物館學習資源時，缺少專業知識、時間來準備學習材料，常常把博物館的參觀活動視為學校學習的調節，以致博物館參觀對學習正式課程的幫助並不直接。博物館則很少吸收學校教師參與博物館課程資源的開發，以致缺少聯繫學生以往的知識、經驗，以及跟進學習之後的評估，降低了學習效果（Griffin, 2004）。

倫敦市博物館的學習項目，吸引大量學校參觀。學校學生成為該館的主要參觀人群。以2009-2010年的資料為例，來館內參加正式學習項目的學生有64,286人，比上一個年度增加160%。參加線上學習項目的學生有18,292人，比上一個年度增長47%。

倫敦市博物館為學校教師準備豐富的教學輔助資源。針對課前、館內活動、課後學習，為學校教師提供這些形式的資源：互動板書設計、館

內活動單、跟進活動和謎語、線上活動等。通過提供充足的教師教學輔助資源，更好的引導學生館內學習和跟進評估學習效果。

以《ASBO》（反社會行為令 Anti-Social Behaviour Orders）這一教程的教師資料為例。它包括5個部分。首先介紹教程與學校課程的掛鉤，從而確保學生學習過程的連續性，在接受博物館學習的時候，具有一些基本知識；其次，說明博物館內活動要求；接著向教師介紹ASBO的背景知識（頒發、管理的範圍）、與經常用以管理未成年人的ABC（可接受行為協議 Acceptable Behaviour Contracts）的區別、以及自中世紀以來反社會行為的處理方式；最後兩個部分，分別介紹了5種課前、課後準備與活動，活動包括了：學生討論、角色扮演、社會調查、辯論、分析報紙報導、自發宣傳、研究城市和郊區反社會行為的異同。

倫敦市博物館也為教師提供教師網路。4年來，已經有1,000多名教師參加。參與的教師可以收到博物館教育的更新資訊、獲得預定博物館參觀服務的優先權、倫敦市博物館書店的9折優惠、參加博物館相關課程資源開發的機會等。

在使用博物館課程資源之後，倫敦市博物館向學校教師分發調查問卷，細緻瞭解教師的意見和跟進學生的學習情況。調查問卷主要涉及四個方面的調查，瞭解教師準備工作的情況、博物館提供的服務與支援品質、博物館提供的學習項目品質、學生的學習成果。根據2009-2010年度倫敦市博物館收集的教師問卷，學校參與了43個博物館開設的學習項目，其中與公民教育直接相關的項目共計14個。學校參觀這些項目的總次數為141次，其中，參觀與公民教育相關的項目共計86次。教師的回答如表一所示：

表一 2009-2010 年倫敦市博物館中學項目學習調查問卷情況

	問題	是／同意	否／不同意
教師準備工作	是否事先參觀博物館瞭解學習項目？	51.3%	48.7%
	是否事先瀏覽博物館網站，獲取相關資訊？	53.6%	46.4%
	是否事先開展博物館教師資源建議的學習活動？	56.3%	43.7%
服務與支援	教學輔助資源能否滿足教師需要？	85.8%	3.3%
	在參觀之前，教師能否獲得足夠的協助？	96.0%	4.0%
	在參觀的過程中，教師能否獲得足夠的協助？	96.4%	3.6%
項目品質	是否滿足學生需要？	99.4%	0.6%
	項目能否滿足學生多元學習能力的需要？	98.1%	1.9%
	是否吸引學生積極參加？	99.4%	0.6%
	學生的學習效果是否能夠得到認可和評估？	98.1%	1.9%
	參加的教師是否會向其他老師推薦這個項目？	99.4%	0.6%
學習成果	能否引起學生的興趣？	99.4%	0.6%
	能否發展了學生對相關科目的知識和理解？	100.0%	0.0%
	能否引起學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00.0%	0.0%
	能否鼓勵學生發揮創新性和想像力？	98.7%	1.3%
	能否鼓勵學生調查和提問？	98.1%	1.9%
	能否鼓勵學生從不同的角度思考問題？	98.0%	2.0%
	能否鼓勵學生聯繫過去和現在？	97.4%	2.6%
	是否鼓勵學生和同學合作？	81.0%	19.0%
	是否鼓勵學生反思自己的學習？	96.5%	3.5%
	學生是否喜歡這個學習項目？	99.4%	0.6%
	教師能否從項目中學習？	96.2%	3.8%

表一顯示，回答問卷的教師中，超過半數事先參觀博物館瞭解學習項目、瀏覽博物館網頁獲取資訊、開展博物館建議的學習活動。絕大多數回答問卷的教師，對博物館提供的支援服務表示滿意。

另外，關於項目品質和學生學習成果的問題也顯示了博物館課程資源關注的重點：關注聯繫學生以往的知識、經驗，重視學生知識、能力的培養。回答問卷的教師，對博物館關注的各個方面給出很高的評價。除了博物館資源促進學生和同學合作的問題，19.0%的教師反對之外，其餘所有問題，都得到超過96.0%的教師認同。尤其是對博物館開發的課程資源在發展學生對相關科目的知識和理解，引起學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方面，回答的教師全部表示滿意。

結語

在課程分權和公民教育課程日趨強調開發社區教育資源的背景下，從何、如何發掘優秀教育資源，以及如何使之為學校公民教育所用？倫敦市博物館提供了一個可供比較、思考的例子。

一方面，倫敦市博物館展示了博物館在服務學校公民教育方面的優點：博物館公民教育主題圍繞現實議題組織歷史材料，能夠加深學生對當代社會現實的瞭解和思考；博物館公民教育過程立體、真實，使用多元化教學策略，充滿樂趣，為學生提供完整的「知、情、意、行」體驗；博物館公民教育資源的豐富，可以為公民教育提供在學校無法提供的場景、物品和環境；博物館館員的素養，可以為學校教師進行公民教育提供充分的、跨學科的支援。回到亞洲國家、地區的公民教育，博物館和學校公民教育的結合也越

來越重要（陳雪雲，2010；謝妙思、劉仲嚴，2011）。比如香港自1997年回歸以來，由一個後殖民地城市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其公民、公民教育都發生了很多轉變，通過結合博物館和公民教育，將有助於幫助學生認識香港的歷史、形成國民身份認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社區公民教育資源，並不僅僅局限於博物館。更何況，亞洲地區有不同於西方國家的博物館傳統：亞洲人較少光顧博物館，博物館的數量比較少，博物館分佈並不均勻，很多分佈在發達的城市等等。這些都給學校公民教育利用博物館資源帶來困難。

另一方面，本文以倫敦市博物館為例子，分析社區公民教育課程資源開發中，政府、學校和社區之間分工合作的經驗。這些分析，對當下亞洲課程分權背景下，更好的開發、使用各類社區教育、文化資源（如公園、博物館、圖書館、大眾傳媒、社區組織、民間團體等）可以提供經驗。

發揮社區公民教育資源的最大功效，不僅需要確保課程資源的品質，更取決於當時、當下各種社會團體、個人的合作與分工，並形成穩定的合作機制：第一，即使在課程權力下放的情況下，中央力量在社區資源開發的過程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如 Fullan & Watson (2010) 所言，課程分權在長足上看，缺點在於沒有對中央給予足夠的重視，缺少協調，中央和地方彼此需要。適當的中央力量，由於其廣闊的視野、政策、協調能力，可以在社區中發掘、引導、保證教育資源及其分配公平。第二，除了課程權利下放給學校之外，社區層面獲得更多課程決定權也是課程分權的一個重要方面。而社區在公民教育資源開發中，也可以成為積極主動的課程決策者。發揮自身優勢。第三，社區和學校、教師的合作，則保證社區教育資源能和學生以往學習經驗聯繫、最大可能的發揮社區內學習對學生各種能力培養的幫助，從而確保社區學習資源的成效。

鳴謝

感謝倫敦市博物館學校事務協調處 Caroline Perry 為本文提供相關資訊，幫助很大，並感謝三位匿名審查者的費心審查，提供許多寶貴意見。

參考文獻

- 吳國志 (2010)。〈新形勢、新機遇：廉署德育資源製作經驗分享〉。《香港教師中心學報》，第9卷，47-52。
- 林建芳 (2003)。〈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在清冷中吶喊〉。2011年8月1日，取自 <http://news.sina.com.cn/c/2003-11-21/10591164498s.shtml>。
- 袁國明 (2001)。〈主題教學發展與特色〉。載袁國明、蔡鳳詩 (編)，《開放教室：學會學習跨學科主題教學》 (頁7-11)。香港：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 陳雪雲 (2010)。〈博物館是世界公民終身學習的場域〉。《博物館學季刊》，第24卷，第4期，5-17。
- 謝妙思、劉仲嚴 (2011)。〈從博物館劇場學習理論探討香港歷史博物館的發展方向〉。《博物館學季刊》第25卷，第2期，19-41。
- Anderson, D. (1997). *A common wealth: Museums in the learning age*. London: DNH.

- Björk, C. (2006). Introduction. In C. Björk (Ed.), *Educational Decentralization: Asia Experiences and Conceptual Contributions* (pp.1-8). Netherlands: Springer.
- Chee, M. F. (2003). Training teachers for the effective use of museu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ical Learn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3(2), 10-16.
- Department for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2000). *Centres for social change: Museums, galleries and archives for all*.
- Falk, J. (2004). The director's cut: Toward an improved understanding of learning from museums. *Science Education*, 88(Suppl. 1), S83-96.
- Fullan, M., & Watson, N. (2010). School-based management: Reconceptualizing to improve learning outcomes. *School Effectiveness and School Improvement*, 11(4), 453-473.
- Griffin, J. (2004). Research on students and museums: Looking more closely at the students in school groups. *Science Education*, 88(Suppl. 1), S59-70.
- Griffin, J., & Symington, D. (1997). Moving from task-oriented to learning-oriented strategies on school excursions to museums. *Science Education*, 81(6), 736-779.
- Hooper-Greenhill, E. (1999). *The educational role of museum*. London: Routledge.
- Hooper-Greenhill, E. (2007). *Museum and education: Purpose, pedagogy, performance*. New York: Routledge.
-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 (2005). Building the capacities of curriculum specialists for education reform. Retrieved December 13, 2010, from <http://www.ibe.unesco.org/Curriculum/Rpack/decentralization.htm>
- King, E. M., & Guerra, S. C. (2005). Education reforms in East Asia: Policy, process and impact. *East Asia decentralizes: Making local government work* (pp.179-208).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 Macdonald, S. J. (2003). Museums, national, postnational and transcultural identities. *Museum and Society*, 1(1), 1-16.
- Mok, K. H. (2003).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changing governance in education. In K. H. Mok (Ed.),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changing governance in Chinese societies* (pp.2-18). Hong Ko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Museum of London. (2010). *Museum of London: Annual review*. London.
- Olson, J. K. (1999).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field trip experience: A formal trip in an informal sett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Annual Meeting.
- Shann, E. W. (1920). Museum in education. *Nature*, 106, 344-345.